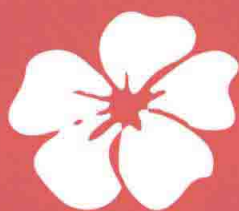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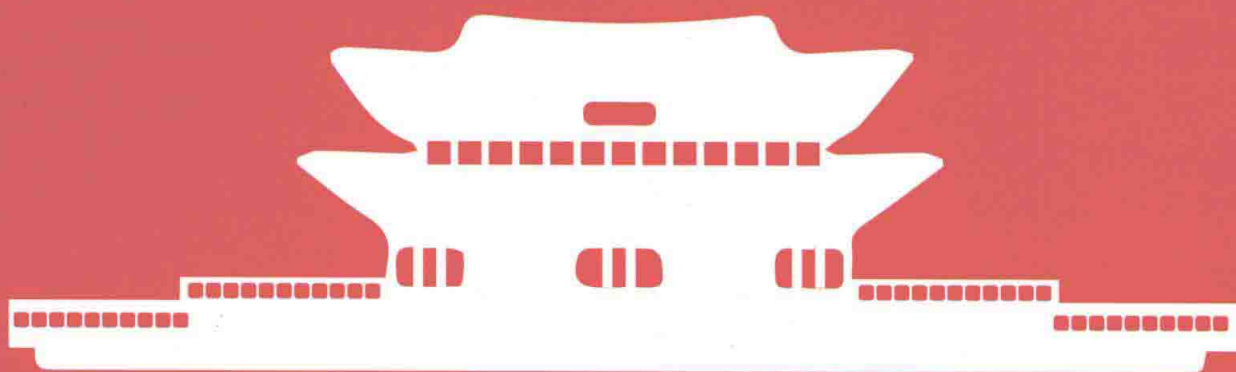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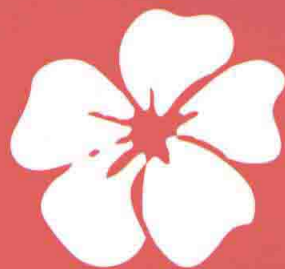




亚洲国家与地区传媒研究丛书
丛书总主编 段鹏



韩国大众传媒研究

政府主导型媒介产业发展的新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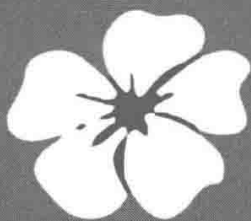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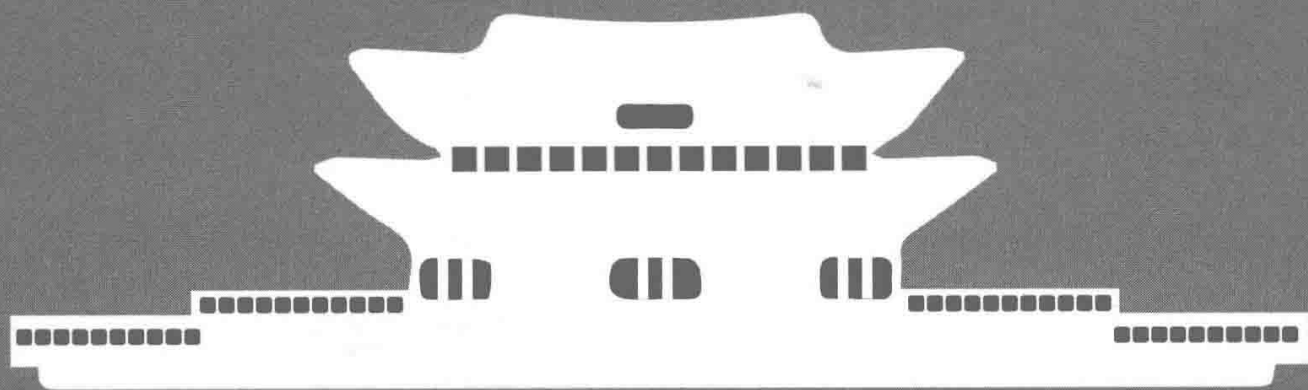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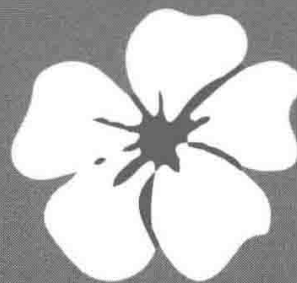
龙耘 赵春光 [韩]李承恩 ◎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亚洲国家与地区传媒研究丛书
丛书总主编 段鹏



韩国大众传媒研究

政府主导型媒介产业发展的新范式

龙耘 赵春光 [韩]李承恩 ©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大众传媒研究:政府主导型媒介产业发展的新范式/龙耘,赵春光,(韩)李承恩著.—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7

(亚洲国家与地区传媒研究丛书)

ISBN 978-7-5657-3182-2

I. ①韩… II. ①龙… ②赵… ③李… III. ①大众传播—传播媒介—研究—韩国—现代 IV. ①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046707 号

韩国大众传媒研究:政府主导型媒介产业发展的新范式

HANGUO DAZHONG CHUANMEI YANJIU;ZHENGFU ZHUDAOXING MEIJIE CHANYE FAZHAN DE XINFANSHI

著 者 龙 耘 赵春光 [韩]李承恩

策划编辑 王雁来

责任编辑 张 蕊

封面设计 郭 琳

责任印制 李志鹏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 真 65779405

网 址 <http://cucp.cuc.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30mm×988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2千字

版 次 202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3182-2/G·3182

定 价 59.80元

本社法律顾问: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 郭建平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龙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曾赴韩国高丽大学言论学部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交流。研究领域包括受众与效果、传播伦理与规制、东亚大众传播等。近年来较多关注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伦理相关议题。

赵春光,山西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伦理、媒介资源分配及规制、影视传播。主讲“传播研究方法”“全球新闻事业概况”等课程。发表多篇与韩国媒介及文化产业相关的研究报告、论文。

李承恩 (Claire Seungeun Lee, 韩国人), 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助理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曾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中国区域市场研究组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大数据与网络安全、媒介社会学、全球媒体和移民(人员、知识、文化的跨秩序流动)等。

亚洲国家与地区传媒研究丛书

韩国大众传媒研究

政府主导型媒介产业发展的新范式

土耳其大众传媒研究

澳门大众传媒研究

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研究

印度大众传媒研究

印度尼西亚大众传媒研究

巴基斯坦大众传媒研究

新加坡大众传媒研究



服 务 传 媒 · 出 版 思 想

目 录

第一章 韩国大众传媒发展概述 / 1

第一节 韩国大众传媒与社会的互动 / 1

第二节 政府主导下的韩国大众传媒发展及传播 / 9

第三节 相关政府机构职能概述 / 18

第二章 韩国媒介市场的维护与管理 / 30

第一节 建立与改善媒介市场环境 / 31

第二节 增强媒介企业的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 / 38

第三节 媒介内容产品的管理措施 / 42

第四节 韩国政府帮助媒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 49

第三章 媒介融合时代主动扶持创意经济 / 69

第一节 支持动画产业 / 71

第二节 扶持外销型文化内容产业 / 86

第三节 为媒介企业的国际合作提供机会 / 97

第四节 助力广播和电信实业的国际交流合作 / 99

第四章 新技术对信息社会数字产业的推动 / 104

第一节 发展智能生态系统和扶植新型产业 / 104

第二节 推动本地的数字化转换 / 109

第三节 助力信息技术标准上的全球竞争 / 112

第四节 扶持未来网络建设 / 119

第五章 建设友好型媒介环境 / 125

第一节 受众参与媒介服务的可能性 / 126

第二节 受众参与媒介服务的必要性 / 131

第三节 保护用户的权利 / 134

第四节 建设健康的媒介环境 / 139

第五节 建立媒介争端的调节机制 / 147

结语：“韩国模式”的特征与启示 / 155

附 录

韩国传播学者访谈之一：亚洲背景下的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

——ACR 主编、高丽大学言论学部吴泽燮教授访谈录 / 163

韩国传播学者访谈之二：韩国新闻传播学与社会互动

——国立汉城大学传播系康贤斗教授访谈录 / 170

参考文献 / 187

后 记 / 195

第一章 韩国大众传媒发展概述

韩国作为一个在政治体制上“形似西方,而神似东方”的亚洲国家,二战后在政治发展上经历了诸多变数,这种变化一直延续至今,譬如近几年的朴槿惠、李明博丑闻。今日今时的韩国政治始终摇摆 in 民主与威权之间,这与历史上韩国的政治发展及形成的政治习惯有密切联系,因此在研究韩国的传媒发展情况时就无法脱离其政治发展及媒介体制。本章从韩国大众传媒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入手,以回顾的方式将韩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宏观社会、政治及文化图景逐一展现,探析现有的国家主导型媒介产业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关政府职能机构是如何推动韩国媒介产业发展的,展现其在韩国传媒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第一节 韩国大众传媒与社会的互动

信息、文化产品、技术以及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得传媒产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而韩国则是这一领域中的典范。韩国传媒产业发展经历了高速推进和向外扩散两个阶段,其中尤以韩剧的

输出影响较为深远。然而近年来由于受到竞争格局的变化、内外部环境
的调整以及审美疲态的出现等因素的影响,韩国媒体的发展整体进入相
对平稳期。为了更好地建设和提升韩国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韩国政府
通过多种方式重构传媒产业的竞争优势。除了不断推进传统的造船、电
子和通信等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成为韩国政府推进战略发展的新着力
点。从“设计韩国”战略到“文化立国”方针,已经过去十多年,取得的效果
相当显著,特别是对 ICT 等新兴产业的重视,使得韩国传媒业的整体发
展走在了亚洲前列。

一、社会与权力体制对韩国大众传媒发展的决定作用

回顾韩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历史,“与社会的互动”是研究其发展不应
回避的一个方面。按照詹姆斯·卡伦和朴明珍的分类,韩国是一个威权
新自由主义社会。^①自摆脱殖民统治以来,韩国政府权力在其政治和经
济发展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从 1948 年第一届政府开始,强人政治和军
事政变将国家权力一步步推向了顶峰。同时,南北分离导致的紧张和冲
突,更为韩国早期的军人独裁统治找到了合理化的理由。在韩国早期军
人政治时期,经济建设成为国家运转的核心内容。同时,源于屈辱的殖民
历史记忆和半岛国家的国民性格,整个韩国社会被一股经济发展的热情
调动了起来,这也为军人政治找到了合法性。在这一社会环境中,民主被
当成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任何政治和文化诉求都被抑制,甚至是遭到血
腥的镇压。而以牺牲政治和文化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韩

^① 卡伦,朴明珍.去西方化媒介研究[M].卢家银,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40-156.

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出口依赖型模式支撑,其弊端在韩国之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了出来。这一时期的韩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是全面而严苛的,乃至出现了随意操控和摆布媒体的情况。传媒在威权政治的威逼利诱之下,渐渐淡化了“看门狗”的角色,开始与政治权力合谋。因此,韩国媒体更多时候是在充当政府的代理人。同时媒介领域的垄断资本也被培育了起来,资本权力在传媒发展中逐渐拥有更强的话语权。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民主声浪的不断逼迫下,韩国政治才开始逐渐民主化。然而,这种民主化与西方的民主化还是有区别的。尽管韩美的同盟关系让韩国深受美国式民主的影响,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韩国政治架构不过是借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躯壳,儒家思想传统仍然是决定韩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因素。这尤其表现在政府的家长式作风上,这种家长式作风的余绪依然存在,影响到韩国媒介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由于地理原因,韩国国内的资源和市场相对有限。他们亟须向外扩张以打通自身的生存空间,外向型经济因此成为主要的经济模式并在技术领域迅猛发展。同时,由于本国的企业处于相对弱势,开拓全球市场需要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坚实的经济力量,本土企业自然而然便和国家力量黏合在了一起,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使得韩国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府权力的附庸。与韩国企业的情况类似,韩国政府一贯控制着媒体,处于媒介产业发展的主导地位。近些年韩国政府对媒介产业的控制逐渐弱化,而之前被政府极力培养的垄断资本则在韩国日趋猖獗,影响到韩国政治和经济诸多方面,尤其是传媒产业领域。因此,在韩国,权力和资本是影响媒介产业的两个主要因素,而政府权力更是处于第一位的因素。

由国家力量培养起来的媒介垄断资本在政治上趋于保守,这造成了媒介内容表面繁荣、内核单一的情况。“在韩国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介的社会影响中,有一种影响可称为文化的同化或标准化。韩国的广播电视业由为数极少的全国性网络组成,这使韩国人很难发展多样化的地区文化和阶层文化。围绕着收视率展开的激烈竞争以及各个频道欠缺自身特点的现实,使各台的节目高度同质化,这又导致了文化在整体上的同化。”^①

二、大众传媒在推动韩国社会民主化、现代化中的作用

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众传媒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随着韩国城市化比率的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80%的韩国人生活在城市里。1996年,韩国每10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为3418人,居世界第一位。韩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转型。目前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这些变化为大众传媒的普及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生存土壤。同时,现代传媒的发展也为韩国民众带来了众多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机会,社会舆论日渐活跃。

(一) 传承文化和促进半岛统一

朴正熙在1970年的“新闻日”贺词中要求新闻机构成为“社会教育的担当者”,以完成“统一大业”。韩国政府文化公报部长官在1974年“新闻日”贺词中再次确认“启发群众、引导国家发展是新闻最重要的职能”。韩国大众传媒所作的贡献十分突出。20世纪70年代,举国上下开展了“新

^① 卡伦,朴明珍.去西方化媒介研究[M].卢家银,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49.

村运动”,韩国广播电台采用移动广播的方式,以农村为对象进行集体听广播活动,组织农家讨论广播小组,在“人的革命”中熏陶和提升民众的民族意识;在“新生活运动”时,大众传媒配合城市支援农村的社会实践,取得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1972年首尔大学设立韩国广播通信学院,进行广播教育。大众传媒在为现代化做出努力的同时,也为弘扬和保护传统文化发力。近年来,韩国大众文化成为社会生活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部分,影响波及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各国乃至日本。而韩国的电视剧是“韩流”风靡的头等功臣。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突出特点是以现代传媒为载体进行传播。大众文化的瞬息万变、超越时空、批量生产等特性都是现代传媒所赋予的。韩国的大众文化直接诉诸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以工业社会和现代都市为背景,同时它也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物质依托,以市场规律的支配和制约为基础,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目前,文化信息产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一般来说,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通常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家国同构”的文化观在社会伦理体系中具有主导作用。韩国的大众传播对伦理文化的整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为民族的统一”的“鼓”与“呼”方面,大众传媒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了实现民族统一这个最深沉的夙愿,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电视台就报道了在平壤、首尔举行的南北红十字会会谈,以及南北协调委员会会议等具有全球影响的新闻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83年一次持续8天共65小时的马拉松式电视报道。其间韩国广播公司为因战争而分离的人们充当媒介,帮助他们找寻亲人的下落。节目最后一集时,寻亲者轮流登场,

每人在镜头前停留 15 秒,字幕呈现本人姓名及被寻找人的信息,同时,失散的亲人通过专线与演播室联系。当时,许多观众被感动,节目的影响波及全世界,成为“韩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在持续 4 个多月的“寻找离散家属”现场特别报道中,9 家地方电视台与韩国广播公司总部合作提升节目的交互性,并且通过洛杉矶、纽约和法兰克福实现了全球连通。这一事件报道的收视率高达 78%,是当时韩国电视史上的最高纪录。有 100 952 名离散家属申请播映,其中 10 189 人得以重逢——这一结果使得这次“寻找离散家属”电视特别报道的性质从媒介事件升华为一次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社会运动,其意义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事件不仅仅是对战争带来痛苦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传递了韩国所有因战争而离散的家庭获得团聚的可能性,因此也被看成是“一次全国性治愈仪式”。1983 年 7 月 5 日至 1984 年 1 月 31 日,《韩国日报》进行 7 个月“寻找离散家属号外发行”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2000 年 6 月,分裂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民族终于迎来了南北首脑最高级会晤,高层对话拉开了和平、统一进程的序幕。这个过程中,韩国的大众传播事业为半岛的和平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推动社会现代意识的发展和进化

在韩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大众传媒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还突出地表现在由民族意识到民主意识的转变上。韩国的大众传播媒介推动了社会现代意识的发展和进步思想的传播。我们知道,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是现代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推动了韩国大众传播的兴起和发展。从韩国复兴至今,在推动韩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发展和现代民主意识的觉醒中,韩国传媒业有过多次可以

写入史册的表现。

有韩国学者认为,在韩国社会的变革时期,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力量一方面是国家和大企业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舆论、大学、知识分子和学生相结合的社会运动。这种形式的社会舆论运动聚集 50 余年来威权主义和工业化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方面造成的后果,不断挑战着国家权力,它的作用是纠正不平等现象、限制权力滥用。社会学界把上述两大核心力量简称为“产业化力量”和“民主化力量”。尽管它们之间经常处在矛盾冲突和紧张状态,但最终取得了互补和互动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大众传媒为这种紧张关系提供了演练平台,正是这种内在张力让韩国采用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民主化模式。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韩国的经济进入持续发展阶段,韩国传媒自身的产业化性质不断表现出来,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由于军人政权的高压政策和新闻限制政策,韩国传媒的声音和参与政治的行为受到遏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界还努力地为民主“鼓”与“呼”。在李承晚政权晚期,《东亚日报》与李承晚之间多次发生冲突,这导致《东亚日报》被迫停刊;在 1960 年争取民主斗争中,韩国报业揭竿而起,将学生的抗议活动变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倒李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4 年,《东亚日报》记者发表《自由实践文人宣言》,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民众提出保障言论、出版、结社及信仰、思想自由的要求,反对政治专制和独裁。韩国民众认为,报纸代表了被政府压制的知识分子的声音,人们应给予它极大的支持。1985 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了《东亚日报》名誉会长金相万“言论功劳奖章”,对该报的勇气和精神给予肯定。

1987 年春,在韩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韩国媒体再次成为重要的

参与力量和推动力量。1987年3月6日,韩国《中央日报》《东亚日报》《韩国日报》等许多报社记者在采访集会或示威游行现场时被警察阻拦,遭受警察的暴力对待。因此,《首尔新闻》等全国26家报社发表宣言,要求维护言论自由,释放被捕的新闻界人士。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总统卢泰愚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让新闻界和广大民众获得言论自由。当威权主义的政治力量造成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时,传媒的声音可以沟通与协调社会关系,传播现代社会公民所需要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至此,韩国现代传播媒介真正成为社会的“监督者”和“协调者”。

有西方学者认为,韩国的新闻工作者大多支持符合民族主义原则的新闻文本和媒体社会实践,所以韩国传媒很难批评自己的国家。韩国媒介的集体主义倾向更为明显,尤其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有时难免表现得情绪化。因此,这客观上也造成了民众在民族尊严问题上的激进和不宽容。有美国观察家认为,韩国人自认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力求寻找共识,人们在不同的报纸上常常看到相同的内容。^① 所以,对于韩国新闻传媒领域的专业表现,我们还要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首尔大学言论情报研究所朴承宽教授认为,韩国新闻业成为国家控制社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新闻业的自治得到巩固,同时成为韩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参与力量,甚至可以介入和影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对国家具有强大的牵制力。但他提醒韩国的传媒,政治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民主化,为谋求韩国社会市民民主主义^②的发展,真正实现社会的民主

① 郭镇之:《跨文化交流与研究:韩国的文化与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224.

② 市民民主主义:强调以发展市民社会,保障民主权利服务于市民阶层的一种民主制度理念,认为“没有市民的民主主义”会导致民主政治的崩溃。

化,新闻业本身的权力需要监督和限制。^①

韩国的传媒界见证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在改革和创新中推动着自身的发展。2004年,韩国传媒领域掀起的“言论改革”,涉及言论的多元化表达、摒除全国性报纸的舆论垄断和鼓励地方媒体发展等多个问题。韩国现代的民主政治与法制社会为传媒提供了一个竞争性的、舆论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某一个政治力量或经济利益集团无法对大众传媒进行独断式操控,大众传媒往往成为各种政治与经济力量共同争夺与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多元的竞争格局,使得某个党派的政治家或经济利益集团不能彻底控制、垄断大众传媒。换言之,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利用大众传媒所能实现的目的越来越有限。多元的社会格局与大众传媒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媒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取决于它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韩国传媒的体制变迁集中体现了社会进步与传媒变革的互动历程。

第二节 政府主导下的韩国大众传媒发展及传播

“韩流”之所以一度席卷亚洲乃至世界并影响巨大,可以说首先得益于韩国拥有的强劲有力、健康完善的大众传媒生产体制。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自由主义媒介市场体系不同,韩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壮大与政府在媒介生产传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1998年,金大中政府对韩国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文化产业定位为“21

^① 朴承宽,张庆燮,韩国的政治变动与新闻业权力[M]//郭镇之,跨文化交流与研究:韩国的文化与传播,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265-272.

世纪最重要的产业”,认为是最适合韩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型产业,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还制定了《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成立游戏产业振兴中心、文化产业振兴院,设立“文化产业基金”,增加文化经费预算,迅速出台扶持、优惠、减税等政策,并负责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1998年韩国成立了文化产业局,随后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并加大了预算投入。^①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干预的重点着眼于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开发。政府主要是为有创造力的企业和部门提供发展的平台,以推动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由于文化产业包含的种类多种多样,政府不可能平均对待每一类别,因此在制订发展战略时要有所侧重。^②

韩国文化产业的范围包括影视、音乐、录像、光盘、游戏、出版、印刷、期刊、广告、动画、互联网等。这些产业多数都与大众传媒相关。韩国政府认为,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文化产业是投入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文化产业范围内的各产业相互联结,在上述产业范畴内的任何一类里取得成功,其“波及效果”会带动其他类别的产

① JEONG, HEON-IL. Analysis of incentive and regulatory systems of basic law for 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J].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7(18): 125-144.

정현일. 문화산업진흥기본법의 유인 및 규제체계 분석. 문화정책논총, 2007(18): 125-144.

② CHOI YOUNG-HWA. The Korean wave policy as a corporate-state project of lee government: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J]. Economy and society, 2013(97): 252-285.

최영화. 이명박 정부의 기업국가 프로젝트로서 한류정책 [J]. 경제와사회, 2013(97): 252-285.

金大中总统还强调说政府愿意只支援文化产业, 不干涉其他产业。